

# 怀念

羊 淇 著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

# 目 录

父亲羊牧之的生平概要 .....	(1)
深切怀念父母亲的一些诗(二十六首) .....	(26)
双亲(二首) .....	(26)
哭母诗 .....	(26)
清明上母坟 .....	(27)
哭悼父亲 .....	(27)
忆老母 .....	(27)
己丑清明赴清明山祭扫双亲及涟兄墓 .....	(27)
纪念家父诞辰 110 周年 .....	(27)
清明扫墓 .....	(28)
回忆幼年感受记事(十五首) .....	(28)
深切怀念我的母亲郑杏珍(二首) .....	(31)
回忆小时候生长在白家桥的十三年.....	(32)

## 父亲羊牧之的生平概要

父亲羊牧之(1901-1999),生于1901年7月20日,小名巧生,后取名牧,字牧之,以字行。江苏常州市人,被誉为出身贫寒,能刻苦自学成材的人;是教育界、文化界有名望的老前辈;是全国有知名度的传统古典诗歌诗人;也是毕生宣传瞿秋白同志作出重大贡献的人。

说起祖辈,我的曾祖父羊万光(1822-1899),原籍泰兴,渡江来武进龙虎塘潘墅一带帮工。后定居潘墅棚门村,1899年卒,享年77岁。祖父羊龄先(1851-1926),随父参加田间劳动,学有裁缝手艺,取妻陈氏,生一子三女。因生活困难,与陈氏又欠合,将家中劳务托付给陈氏及长子羊坤芝后,长年在苏州、蚌埠、常州城里打工。做裁缝,干旅馆茶房,茶馆打杂,当富人家门房,或帮着到乡下收田租,最后摆小摊糊口。祖母徐氏(1967-1923)武进三井乡徐家村人,19岁时与邻近的陈家村弹棉花的陈姓男子结婚。未几年,该男子患肺病去世。徐氏成了年轻

的寡妇，去江阴小湖大岸村和贤庄曾任广东监运使金心芗家做侍女，服侍金衡玉小姐。瞿秋白的叔祖父，亦即秋白父亲瞿稚彬的叔父瞿赓甫，官任湖北布政使，后升巡抚，未到任而病逝，但余荫犹在。常州城里青果巷有一宏伟的大宅院名八桂堂，内有天香楼。1898年，瞿稚彬到离城二十里的大岸村金心芗家与其次女金衡玉成婚满月后回到常州，即住进八桂堂天香楼，与堂兄弟姊妹等大伙一起吃住生活。我的祖母徐氏作为金衡玉的陪嫁侍女亦随之服务在这里。也就在这年，祖父龄先到这个大家庭做裁缝，帮着到乡下收取些许田租，结识了早为寡妇的徐氏，私下结合后，于1901年生一男孩，取名巧生，即后来成为我父亲的羊牧之。

稚彬、衡玉住八桂堂天香楼，于1899年生下秋白。后因大家庭人多，经济来源又缺，生活日见困难。稚彬、衡玉带着婴儿秋白乃搬出分开，赁屋住乌衣桥。后又迁至织机坊（今延陵西路）庄氏星聚里九皋楼下，因庄氏为秋白祖母的娘家。最后又因生活困难所迫，住进城西庙沿河瞿氏宗祠。父亲随母亲徐氏寄食于瞿家多年后也就离开宗祠的瞿家，住进

茭蒲巷花椒园贫民窟里。几年后，又赁屋住麻巷西头一陈姓家门口的小房子里。父亲生长在这样特殊而贫困的家庭中，因缴不起学费，进育志小学（新坊桥小学前身），只读到五年级就辍学在家。但他好学求进。离开瞿氏宗祠后，还时常去宗祠，由秋白教他数学、英语、给他《泰西五十轶事》等书籍，还有一本《花月痕》小说。每次回来，总是好好地自学。又恰巧这期间，他与父母住的陈姓房主家，订有若干报刊，邮递员送到门口，他总是先阅为快，获得了一些新的知识。又陈家有不少藏书，主人发觉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喜欢读书，借给他《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书，父亲如获至宝，白天及夜晚油灯下，仔细阅读，并择抄背诵。他央求父母给钱从旧书店里买回一本《康熙字典》，对不认识、不懂的字，翻查字典，得到解读和释意，从此爱上了古诗文。过一时期，家中生活更拮据，一家搬住到白家桥堍简陋小屋，在门口摆小摊，卖些荸荠、山芋、野桃、小糖子、针线、草鞋等度日。此时也巧逢机遇，武进北乡焦溪一位有名望的乡儒吴卓铭，在白家桥郑家场前后郑炳森、郑炳照家设塾，执教郑家及邻户家孩子，父亲

亦进塾受教。由于他年龄稍大，天资聪慧，好学不倦，为卓铭先生赏识，另加指教，乃更加用功。不久，父亲竟被择为助教，卓铭有事不能来时，由他代为授课，两人遂成忘年交，父亲的古诗文大有长进。自学成材，教学相长，亦可为人师了。为了解决父亲家的生计，由卓铭介绍他到武进北乡锁石桥及长田埂等小学任教，从此走上了教育工作的岗位。其间，1921年，由郑炳森及“四婶婶”（我们小辈称她为“弄里舅婆”）看中，父亲与炳森家女郑杏珍结了婚。此时同在白家桥街上，居有前清进士钱名山先生，他辞官归里后，在寄园设帐授徒，从学者甚多，父亲亦曾从批受学于寄园名山先生门下，学识更有大进。之后，他在沪、汉参加革命工作四年（后面详谈），回常后，即先后在武进女子艺术职业中学、辅华中学、上海景平中学任国文教师。但都为时不长，因时遭“思想左倾”“有共党嫌疑”之说，被辞退了工作，时常失业在家。我的母亲常摺纸锭至深夜，并经常跑当典当物，聊以糊口。祖父母则在儿子成家后，住到大井头了。1923年，祖母徐氏病逝，享年56岁。1926年祖父龄先亦病故，享年75岁。所幸他俩已看到有

了嫡亲的孙子。

1937年初，父亲在上海景平中学任教，又被嫌为“共党分子”而失业在家。后去城里庙西巷东头某富家代卓铭先生任家庭教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举行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正值淞沪会战，我军开始撤退，兵荒马乱之际，父亲为解决一家人的生计，乃投笔从戎，矢志抗日，经考试录取，到设在镇江的国民党政府陆军通讯兵团任文秘工作，后任营政治指导员，随军经江西、武汉、到了湖南常德。母亲则带着四个孩子，随四婶婶逃难到武进南乡庙桥钱家村。1938年春，父亲辗转来信，并寄款至上海原白家桥邻居张增元处。母亲乃带着四个孩子乘民船至沪，会同在上海当学徒的长子一共六人，在张增元及原白家桥房东吴师母帮助下，乘英商太古轮至香港、九龙，再乘火车至湖南长沙。复经名山先生次子钱仲易帮助，坐轮船至常德与父亲会合。在抗击日寇的侵略中跋涉千里，颠沛流离，悲欢交集，由此可见。不久，武汉失守，长沙吃紧，一家随通讯兵团迁至湘西之浦市。父亲又因下面要谈到的写诗以隐喻怀念故友，并资助进步青年张才甫去延

安，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嘱另谋工作。父亲慷慨地用黄仲则《都门秋思》原韵写了《秋感》四首七律，寄长沙第九战区干训团政治部主任彭国栋，得到赏识，接收到该团任政治教官，旋又去湖南省干训团任同样职务。1941年父亲终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离开了该处，到湘乡中学任国文教师。这样前后共计四年在国民党政府部队和干训团任了职，又回到教书的工作岗位。1941年秋，父亲由于与湘北名士萧荔衡有诗交之谊，被推荐到邵阳竹篙塘国立第十一中学任高中国文教师，时用羊牧的名字。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十一中迁至岳阳，改为岳阳中学。父亲又以抄呈诗作，寄江西教育厅秘书长李莼，被聘为江西九江中学高中国文教师，在该校一年，经名山先生第三子，时在省立常州中学执教的钱叔平推荐，回到常州柏桢中学任高中国文教师。1949年常州解放，该校改名为育民中学，被任命为副校长，兼教国文。因不愿做行政工作，请调去江阴县中任教。1952年即调任省立常州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担任过教研组长。十年之后即1962年被调出筹建瞿秋白故居、纪念馆。后又调

任市政协常委、专职副秘书长。到“文化大革命”，被诬为“吹捧叛徒瞿秋白”之罪名，遭到批斗。但他坦然处之，说“中央出了坏人。”并坚信瞿秋白不是叛徒。70岁时，被市政协通知办理了退休手续，在家里看他爱看的古诗文，写他爱写的传统诗歌。这样，父亲自武进锁石桥小学起到省立常州中学；从常州、上海、湖南、江西，再回到常州，前后从教达四十余年，且一直教授国文，惠及数省市莘莘学子，可谓桃李满天下。1949年解放后，有多处学生曾远道来常州拜望我父亲，极尽尊师之道。

父亲毕生好读书，手不释卷，尤爱传统古典诗歌，进行创作实践。到老精力还是那么旺盛，写诗写到临终九十九岁。他是活到老，吟哦到老。生命不息，诗歌不断的人。因而人们称他是“世纪同龄”、“诗坛寿星”。他生平创作古典诗歌近二千首。可惜“文革”期间被抄家，诗稿悉数抄没。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归还被抄的文物时，内一卷《诗存》竟已无着。该卷多抗日战争胜利后至解放前夕之作。秦火乌台，能不慨叹！收集在他所著《秋华馆诗存》中的诗，有1100首。收集在

《秋华馆诗存续编》中的诗有 400 多首。两集共计 1500 多首。

父亲的诗，秉承《诗经》、《离骚》和汉、魏、六朝遗风，盛唐诗歌的典范，以及清代流派纷呈的后劲。能采百家之长，学习古人，不囿于古人。适应时代之进展，自抒胸臆，自成风格。他的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格律谨严，有时代感，寓意较深，清新隽永，潇洒自如，风韵有致。且通俗易懂，琅琅上口，深得人们的喜爱。在救亡图存，艰苦奋斗，八年抗日战争中，父亲拖男带女，经历血与火的洗礼，过着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俨然以少陵之笔，写下很多可歌可泣，充满现实主义的诗篇。如七古《离家》，充分反映着抗日时期人民颠沛流离之苦，沉郁而凄楚。七古《哀岛虏》，则正气凛然，描述了我国军民英勇抗日的决心和威力；怒斥日寇的侵凌和狼狈惨败的情境，充满着激情。七律《书愤一首寄呈海上名山夫子》，则谴责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可耻行径，颂扬了我国将领英勇抗日的决心。他的古风《鵩鶲曲》、《求死翁》、《父母心》等，对民间疾苦，社会黑暗，能奋笔疾书，予以同情，并深表谴责。而名为父母官，却不

为民解难济困，高高在上，诗人能不表示极大的愤慨！这时期，他也有若干倾抒飘泊之苦，深感怀才不遇和不平之鸣的遣怀之作，十分感人。如《宿耒阳小水铺》、《不寐》、《秋感》、《落花词》、《天涯》、《己卯除夕》等七律。这些诗对仗工整，辞句清新，情意真挚，抑扬顿挫，韵味无穷，感怀之深，有如杜甫七律之沉雄苍凉，读来回肠荡气，使人心动。诸如上述一些诗，流传三湘间，曾被人誉为“今日之杜甫”。父亲作诗同意袁子才的性灵说，也欣赏王渔洋的神韵说，故有时也有一些神来之作，读来顿生快意。如《江上杂诗》、《抵九江》等。这些诗，既有袁枚的性灵，又有渔洋的神韵，爽快流漓，一舒心胸。

进入解放后的新中国，父亲的心神是愉快的。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人民生活的改善，国际威望的提高，一再表示由衷的高兴，热情地予以歌颂。例如解放初，他写了《和毛主席送瘟神》四首七律，对新社会的新气象，给予高度的赞扬。他从不填词，1959年国庆日，兴致所致，填写了几首《忆江南》，以自身的经历，作新旧社会乐与苦的对比，情意真切，可谓体验良深。《建国三十五周年观感》一首五古，

简短明了，一气呵成，清新突目，足以自豪。

父亲是一个耿介、正直、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具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时抱爱国忧民之心。在解放后的大好形势下，逐渐看到新社会出现的弊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及之后的腐败现象，是十分困惑而至痛恨，斥责的。“文革”期间，他并不畏惧视古典诗歌为“四旧”的极左思潮。默默地仍然写他喜爱的传统古典诗歌，多达百首，以示消闷、遣愁、抗争、抒发自己的感慨。他的《不识》、《咏雪》的七绝，用隐喻手法，以“封姨”、“黄叶”、“雪花”喻江青，仗势搞乱“文革”，使“六合无声”，人人自危，国无宁日，迸发出诗人的愤慨，广大人民的不满。此类诗流传沪上、为众多诗家赞赏。

父亲趁“文革”及退休之闲，到苏州大女儿家小住，遍游苏州园林，写有《姑苏纪游》十处名园古迹，都写得精美雅致，情景交融，各有特色。从苏州回常州后，先后又作《阙题》、《寒夜》、《梅与桃》、《诸儿》、《自适》、《咏史》、《难凭》、《老至》等诗。都抒发了自己的深情感慨，聊以解闷，均能动人肺腑。又他用比喻手法，对腐败分子的贪婪猖獗，对某些官员包庇

放纵，不问民间事，但谋饱私囊，害国害民的恶劣行径，写下《咏鼠》、《懒猫》、《不倒翁》。对此刻画得丑态百出，入木三分，读来无不使人痛恨，叫打。

在畅游中国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父亲写有不少咏史之作，评价了许多历史人物。从李聃、庄周、屈原，到近现代的章太炎、鲁迅等达 130 多人，且颇有见地。若非对中国历史有一定的研究、了解，是不可能写出这么多人的篇章的。父亲一生经历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饱揽众多名胜古迹，每写有诗，或之后回忆记之。即使写常州本地的不计在内，写其他地方的诗达百十多处，而且色彩鲜艳，风光别具。如《江上杂诗》、《江城咏汇抄》、《金陵杂咏》、《姑苏纪游》、《回忆十九首》、《胜地杂咏八首》、《续胜地杂咏四首》等组诗，都各有其特色。

父亲一生自立、自砺、自强；两袖清风，一身正直；不事权贵，不阿谀奉承，乐于清贫。他的傲岸骨气，倔强性格，时常流露在诗作中。例如《秋华馆诗存》卷首自题云：“毕生坎坷，百无一可；历尽沧桑，我还是我。”由此可见一般。我的母亲郑杏珍(1901-

1994),忠厚仁慈,勤劳俭朴,一生过着贫苦的生活,含辛茹苦,关怀备至地照顾父亲,带着六个孩子。总是把苦吃在自己肚里,把乐让给别人,一向为邻里称道。父亲为此写有多首感激她的诗。如《内子郑四十初度为赋八律》,可称上乘之作。

父亲一生中,突出的成就之一,是毕生为宣传瞿秋白同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得从他自幼与秋白生活在一块说起。秋白生于1899年、属狗。父亲生于1901年、属牛。秋白长父亲两岁。父亲的母亲,即我的祖母,服侍心芗女金衡玉。后随衡玉陪嫁到瞿稚彬家做女佣,前后共十八年。稚彬、衡玉带着秋白从八桂堂分出住乌衣桥时,我父亲刚出生。自此即随母寄食于瞿家。从乌衣桥到星聚里九皋楼下,两个孩子都由我祖母徐氏带养。晚上三人同床而卧,欢乐无比。稍长后,两个孩子同时跟着瞿母金衡玉吟诵唐诗及宋词小令,也一同玩耍,故两人自小为总角交。父亲在解放后刻一闲章“阿双儿时旧伴”,即记下这段经历。瞿家因经济来源无着,生活难以维持,迁居庙沿河瞿氏宗祠后,祖母徐氏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就离开了瞿家,住到茭蒲巷花椒园贫

民窟去了。但父亲还时常去宗祠看望秋白，并在此认识了张太雷。后瞿母金衡玉因生活窘迫而自尽，秋白去湖北并去北京堂兄纯白处，两人就没有再见。分别十年后，1925年父亲在上海南市工人夜校任教，经高语罕指点去某里弄找到了秋白并见到了杨之华。两人分别十年，得以重逢，惊喜交集，几次欢聚交谈后，父亲抄赠《书感》一首七绝，秋白批评未免萧瑟，并经两次赠父亲五古四首，诗中有“我意斯文外，别有天地宽。词人作不得，身世重悲酸。吾乡黄仲则，风雪一家寒。”勉励父亲投入社会变革熔炉中锻炼自己。起先，秋白说介绍他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后又改变主张，介绍他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复介绍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介绍到中共宣传部工作，做《向导》党刊的校对及其他杂务。当时中宣部长是彭述之，负责编辑《向导》的是郑超麟，部里还曾有过黄玠然等。在此期间，父亲还认识了陈独秀、彭述之、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央领导同志。1927年春，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中央迁武昌，中共中央迁汉口。父亲与秋白先后到达。中宣部设在辅

义里，部长已由秋白担任。经秋白指示，父亲曾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连同秋白写的序，一併交书局印成小册子分发。这时，周恩来、趙世炎、罗亦农等领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取得了重大胜利，可是蒋介石原形毕露，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醒屠杀共产党员及工农群众，上海、南京等地，一片白色恐怖，形势骤变。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五大”)。父亲参加了大会，作为一个工作人员，他协助布置会场，放哨，联系秋白，有时又去作会议记录，忙的不亦乐乎。不久，主持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叛变了革命，与南京蒋介石把持的国民政府合流，一起进行反共。各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时局急转直下。一天晚上，秋白要父亲一同到鲍罗廷公馆开会，会上秋白、太雷等根据鲍的发言，讨论了建立军队，武装起义的问题。七月下旬，秋白等还去九江开了一个秘密小会，商议南昌起义之事。八月七日，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在国际共产的推动下，由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确定了注重农村工作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为党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会议并组成

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常委会，由秋白主持工作。这时，共产党转入地下，由国、共一起发动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的叛变，窃取了领导权，乃告变质失败。接着中共中央及秋白等同志就迁回了上海。在汉口期间，父亲不仅与张太雷重逢，而且还认识了任弼时、叶挺、恽代英、郭亮、向警予、李立三、郭沫若等同志。一次张太雷要父亲去秘书处工作，上海时的秘书长是王若飞，此时已改为邓希贤（即邓小平），父亲刚要去，张太雷又要父亲留在汉口，负责中共中央驻汉口联络处工作。父亲在汉口联络处工作期间，曾接待路过汉口的郭亮妻子李灿英带着幼儿多难。接待过贺龙、周逸群将去洪湖及湘西开辟革命根据地，还曾接待路过的刘伯承。一次，李维汉（罗迈）来该处开了一个星期的会，商讨攻打长沙之事。会后李留给父亲一张条子“中兄嘱你回沪”，于是父亲由汉口返回上海，见到了杨之华，但秋白已去莫斯科筹备召开“六大”未见及。父亲住在一个旅馆内。时中央决定调他去浙江宁波到四明山区任浙江省委委员，不料浙江省委此时接连两次遭破坏未去成。父亲写信到常州或由在上海的张增元